

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

在空间的密林中

AMIDST A JUNGLE OF SPACE

唐克扬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

在空间的密林中

AMIDST A JUNGLE OF SPACE

唐克扬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空间的密林中 / 唐克扬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1

(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

ISBN 978-7-214-07645-8

I. ①在… II. ①唐… III. ①建筑艺术—艺术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234号

在空间的密林中

唐克扬 著

责任编辑: 吴雪梅 刘 焱

责任监印: 安子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凤凰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 022-87893668

网 址: <http://www.ifengspace.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127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4-07645-8

定 价: 2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销售部调换)

自序

还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写一部有关“中国建筑”的书，这似乎对于相关母语文献匮乏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人们习惯了流水线制造连夜攒就的“论文”，殊不知“论文（essay）”绝不是简单地以立场代替知识，以知识代替问题的，总合了立场、问题和知识而在西方同类思想中汹涌而来的“智识”（intellect），使得大多数现有的中国建筑写作都有些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又有一种双重的沉重感撕扯着我的神经，使得围绕着“中国建筑”的讨论不能尽欢于学院高阁的“白”。这种沉重感，当然，首先来自我们所面对的不尽纯净的、充满“杂声”的物质现实：一家人拘于数平方米的城市斗室中的成长经历也许还算不上什么，那么，描绘我们这个古老而庞大国度的通景画一定是更为触目惊心的，它不能被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所囊括，而一定是摇摆于汗漫和具体而微之间，那是费正清为《两种时间》（*Two Kinds*

of Times) 写序时所谈到的亟须“福楼拜、笛福、巴尔扎克”三支大笔而不能尽书的故事,是值得每个曾经在这里浸透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某种真实的原境。

然而,即便经过苦苦思索,我却始终无法确立这样一本著作的准确体例,它无法是年谱、地志式的小尺度编目:甲、乙、丙、丁、卯;A, B, C, D, E。也不能是 19 世纪博物学家的百科全书那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构,这样的缺憾既因为学力所及,也缘于今天这样一个现实:以有限的智力和知识构造一个无限圆周式的体系,终究是在时间的螺旋线上游嬉笑大方了——毫无疑问,我的选择只有一个:抓住某些紧迫的、有感的、具有举一反三作用的议题。

本书收录了我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对于当代建筑问题特别是“中国建筑”的思考,也算从以上感悟出发,对于“中国现实”的某种答卷。它们绝非面面俱到,充其量,只是由于连续的个人经历和思维方式的整一性,保证了它们较为完满的感性和真实;与此同时,既然是某种面对现实的思索,那么就无法不同时面对广阔的理路和这些问题共享的基础,值得在这里预先写下,作正文的铺垫。

首先,讨论“中国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前提,这是我在为此这个专有名词加引号的原因。如果说“建筑史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对大多数建筑师还过于抽象的话,“传统”或者“文脉”都不会是什么陌生的说法吧!可是“建筑学”(20 世纪初由留学生自西方引入)之前的中国营造该如何定义呢?传统自身的传统是什么?文脉之外的文脉又是什么?对某些只爱好“创作”的建筑师而言,建筑理论或建筑史几乎已经可算做建筑设计外一个边远学科了,它的岌岌可危到了没有“产值”就要被淘汰出局的地步,可是我依然要说,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目的并非为去寻找某种“原型”或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在于在博古架上徒然增加可以拼贴的品类,而是在于观察它作用于现实的门径,柳暗花明却又殊途同归。由此,

我们理解既往经验和现存逻辑的意义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本质”中的权威，而是在各种广阔的“意外”中寻找万千变化的可能。

对以上设问的解答很可能也是打开更一般问题之门的钥匙，它意味着一种同时宏观阔大和具体而微的思路，意味着本身即兴趣盎然的写作，这里的理论和历史反倒是凸显了开放的建筑学“实践”的重要性。

很多当代建筑师同行对于“建筑本位”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但这种思考有时纠结着非传统和“创新”的冲动而难免归于无处了。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学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笛卡儿“空间”之外的可能性，大多“创新”依然离不开传统的和翻新的“类型学”的自说自话，它在寻找建筑内含的语言和意义的同时却忽略了语言所有的沟通功能，须知语言的意义来自于实践，“体”与“用”是两个无法脱离的层面，中西方思想的区别，不仅仅是来自于渺渺乎天人之际的“本体”，而是来自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具体的主体，在于“此时此刻”的“手中”和“体内”。这样的探究是什么时候都不会沦为抽象的，也很难为某一两种特出的主张所囊括。

20世纪初在中国建立的“建筑学”完全是个舶来品，因此更加离不开它在新情境中的不同体认——理论关乎宏观，阐释则牵涉到局部，两者又是通过具体的沟通手段绝对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建造、媒体、建筑图或是广义的建筑再现（representation）手段，因此是我十分关心的内容，它们既包括建筑师感受的转化，也涉及建筑作品如何为更广阔的社会所接受（建筑写作者的本分，就是传达这样一种活泼实在的经验）。这样看来，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皮相”的问题其实是实质而不是手段，或者说，它们可以同时是出发点和目的地，既新（表述方法）且旧（诉诸熟悉的感受）。例如，近十年中国的都市化的主旋律中有“城”与“乡”的变奏，在另一端则兴起了“景观”和建筑学的关系——从社会沟通的角度

而言，它们并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在我国方兴未艾的“都市景观”本是立于“城”和“乡”的二元对立之上的，这些问题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套用今天的专业标准而只能回到它们最初的表达方式里去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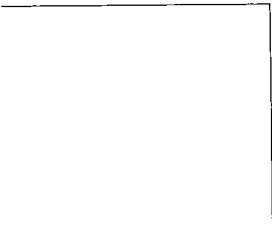
“情境”和“身体”因此共同织成了更为密致的“文脉”，使得我们对于营造的理解不仅仅囿于“纯粹建筑”，还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和它们的高级表现形式——比如艺术；我们可以讨论的不仅仅是今天的建筑，还有历史上的城市，乃至整个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扩展知识视野的同时，这样的讨论又不是面面俱到的，对于个人视角重要性的强调，让“总体建筑”最终不至于沦为泛政治化的讨论，而是导致某种开放性的答案。例如，历史上那些被认为“落后”的城市规划（奥斯曼的巴黎改建）真的是毫无是处吗？其实过去认为他们对的人，就和今天认为他们错的人一样多。这样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深思的：因为智者不会空言集体的“态度”，也不会放大表明个人诉求的“愿望”；只有同时审视“非常建筑”和“平常建筑”，才能理解中西建筑学巨大的差异性——时间的差异性，以及高等文化和低等建筑之间的差异性，回到“明星建筑”和“普通建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间的中道，在各种看似不相关的现象之间建设出坚实的桥梁。

和很多时报、月刊读者的想象有所不同，在建筑写作中作者的“趣味”并不十分重要，明星项目中使人惊悚的物质性光环也并不重要。任何有价值的写作，除了“要做得如何如何”之外，还必须以“别变成那样”而自勉，原因其一就是不要在思想自身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仓促地变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僵硬无趣的言说（带有过强政治性和专业性议题的狭窄主题）；其二就是不要“似是而非”，这对于大量汲取西方知识而不具有消化能力的当代中国而言尤其严重。而为了避免这一点，除了加强翻译和导读，

恐怕还要勤于反省和自察。

建筑或许是无法写作的。那么倒过来，写作不应该成为建筑创作的奴隶，因为建筑思想应该是从建筑出发，抵达人类共有的思想。

目录



引子 回望的视角

005 又见长安

空间细语

015 在空间的密林中

027 看不见风景的房间

040 与墙有关

046 渐变的歧路

社会戏剧

059 橱窗的故事

065 美术馆是个剧场

082 女性的房子

093 数字建筑的决斗

生长的城市

107 村门树

118 一座中国园林的生与死

132 纽约的夜与昼

引子 回望的视角





省城西安府北门

恩斯特·鲍希曼

银版照片，1906 年

德国建筑师恩斯特·鲍希曼自 1902 年开始研究中国建筑，从 1924 年起，他还在今天的洪堡大学和柏林理工学院教授这一主题的课程，并成为一名汉学家。鲍希曼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但他通过自己的摄影成为一名很好的甚至是带有诗意眼光的观察者。

又见长安

我的面前放着一张照片，照片的下方用英、法、德等六种文字写着“省城西安府北门”。我知道，这张历史照片的摄影师是德国人恩斯特·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不经意间，他成了中国建筑最早的西方研究者之一。鲍希曼写过一本《如画的中国》（*Picturesque China –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 A Journey through Twelve Provinces*），这张照片摄于他那次著名的中国旅行的途中（曾经在当时的德国海外领地青岛担任过建筑师的角色）。鲍希曼横跨中国 12 个省份的远征始于 1905 年在德国国会大厦中进行的关于中国的讨论，这一刻，离 19 世纪末德国侵占胶州湾并全面推展它后来居上的殖民计划不过七八年，德国政府资助这次远征的动机昭然若揭。

浩瀚无垠的天穹占据了画面的一半，在剩下的那一半里面，浓重的阴影又占据了将近一半。在水平伸展的画面上，可以识别的就

剩下两条几乎完全水平的横线，这横线的自右往左，刚好也就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由内及外，依次是城楼、箭楼和闸楼，城墙、瓮城和月城，城墙下方，似乎已经干涸的护城河已经看不见痕迹，只有一条土路，差不多完全平行于城墙的方向，路的终点是一座和上述建筑物似乎并不相连的、孤零零的小城。

即使在高清晰度的银版照片里，这张照片也几乎没什么透视感，建筑物看上去更像是大地尽头模糊的景观——一抹绵亘在天际线上的不分前后而只有左右的遥远山脉，没有人类生衍的气息。在那条土路上，唯一能提示点什么的，就剩下一个孤独的、不知去从的旅行者，使得画面中平添了一丝诡谲。棕褐的色调里，一切都停止了，停止在迫近黄昏的时节；隐藏在镜头这边的摄影者，似乎是站在一座微微高起的土垄上，荒寂无人的前景中，投落了一大片斜长的鬼魅般的树影。

当我凝视着眼前这张遥远年代的照片时，有一种奇怪的无以言传的感觉，将此时此刻的我和摄影师身处的那一瞬间彼此连接，又陡然相撞——拍摄这照片的时间距今不过一百年，我的知识告诉我，这照片拍摄于西安明城墙的北门安远门外，差不多就在那条土路横亘的地方，20年后一列吞吐着白烟的火车将要呼啸着通过新建成的陇海铁路，老西安人所说的“北关”从此被赋予另一种涵义——你将会看到大量的零杂人事，从上述空无一物的画面里，吵吵嚷嚷地不可思议地涌将出来，将现代人想象中宁静的古典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这照片中冷峻和陌生的景象看上去还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数年之前的一个冬日，我还曾从照片中那座高大的城楼旁走过。穿过那道已被洞穿的灰色城墙，我的目的是前去踏访另一座建筑的“遗址”，那就是唐代长安城北位于龙首原上的大明宫，它大约就在画面左侧，明城外的东北方向，而鲍希曼置身的地方大概和唐代

皇城的禁苑相去不远，值得一说的是，由于后来城市缩小的缘故，此时的城外，在唐代或许是城内，但是即便是城内，这部分也将是同样荒芜和冷寂的。自从隋文帝因为旧宫地势低洼、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择址建立大兴城以来，长安的统治者们一直非常忌讳向下走泄“王气”，皇城以南靠近宫阙的三十六坊，仅有东西街道，只开东西门，不开南北门；城市的北部呈现出虚空的态势，即使城北的禁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墙，平民也不能随便涉足其中。

说我置身的地方原是另一座“城市”，多少有些令人困惑。相形于蓬勃疯长的现代西安城市，那失落在蒿草间的千年之前的过去，不过是个非常不引人注目的痕迹。比如，当你从北关外大道向东穿过龙首村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上坡，那荒草覆盖并就地势高出的地方便是大明宫西宫墙的位置了——我猜。

其实，最终我什么也没看到，也没法看到。

今天，当我看到鲍希曼一个世纪之前拍摄下的这张照片时，忽然又想起了数年前的那次寻访，想起了那次对我而言富于象征意义的考古旅行。在研考地图和地方史志中熟悉了长安和洛阳这两座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之后，我抱着驱使谢里曼发现特洛伊的好奇与激动，踏上了西安市城北的那片嘈杂的村野。尽管我知道，今天的西安城差不多已经完全“覆盖”了旧日的长安，我还是忍不住想知道，过去是否会给今天留下了一星半点可以辨识的东西。

正如上面所说，最终我什么也没看到。中国人对于历史常常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如在眼前”的历史，比如唐代人的音容笑貌、市井生活或日常起居，乃至坊市宫室本身是个什么样子，却不见得有人真的知道，或真的在乎。或者，是由于物理遗迹本身的脆弱，或者是由于一种对于“变化”所持的漠然心理（这种漠然，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晚近的商品社会才演化出来的对于传统的蔑视），使得历史保护主义者和另类开发商们对于“遗存”殊途

同归的热心显得尴尬。不久之后，我有机缘两次掺和——而不是参与——大明宫遗址开发的项目，可是项目设计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遗址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它和现代人的感性已经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了。已经成功商业运作的大唐芙蓉园和大雁塔广场项目，个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真正“历史”，使得围绕着那孤塔与荒泽的歌舞和烟火竟成了一种无声的讽刺。

今天想起来，在那没有秩序、没有任何显著史“迹”的混乱中，其实也分明可以“看”到另一种东西，它并不赏心悦目，却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东西不独回首上苑时才能“看”到，而是和每个中国人的成长经历息息相通。数年前路过那里时我看到，含元殿前的横街已经成了小煤窑的运输要道，骑着三轮车的农民工在泥泞的土路上奔波，昔日的大内今日是都市边缘的荒野，沿着旧时宫禁道路横七竖八布置开的棚户区，风格和气象都浑无开元印迹，倒是路边刁蛮斗斗的顽童，依然不减五陵少年的旧概。

只是这种穿透我们生命经验的“看”，却不能像鲍希曼的照片那样呈现出一个“如画”而迫人的中国。

今天，鲍希曼的照片使我意识到某种富于意义的巧合。它拍摄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而已经是发生裂痕的过去——镜头里的巍峨城阙并不是王维歌咏过的三秦首辅，而是经后人潦草收拾的地方府治了，但这些并不重要。在那张1908年拍摄的照片中，鲍希曼或许是第一个从北面打量西安——或长安——的人。而像我这样踏上文化的怀乡之旅的中国人，恐怕很难想到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去观察这座城市。

形成戏剧性比照的是足立喜六《长安史迹》中的一张由明城南望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1906年——与鲍希曼远征的同一时间——他们的邂逅大概不仅仅是个巧合。其实，足立喜六本只是陕西高等学堂的一位日本教员，但受了同往陕西游历的日本学者桑原鹭藏的